



# 应运而生的黄金一代作家

——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回顾 □张志忠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的文学进入了持续发展的历史时段,出现了一批堪称经典的优秀作品,出现了应运而生的“黄金一代”(为了简明起见,我的论述仅限于小说家),这是百年中国新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在中外文学史上也是值得关注的重大现象。

属于“黄金一代”的作家,上起1929年出生的宗璞、徐怀中,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王蒙、李国文、从维熙,下至60年代出生的余华、苏童、迟子建、格非、毕飞宇、麦家、林白、陈染,其中坚力量是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冯骥才、刘心武、李陀、梁晓声、张抗抗、史铁生、莫言、张炜、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曹文轩、铁凝、张承志、池莉、方方、刘醒龙、刘震云、徐小斌、阿来等。以年事已高的老作家而言,宗璞和王蒙在号称“百花时代”的1956—1957年,发表了《红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一举成名天下闻。2010年以后,他们又分别发表《西征记》《北归记》和《这边风景》,再一次证明了其蓬勃的创作活力。徐怀中在上世纪50年代即以《我们播种爱情》名世,近年来,继长篇非虚构文学《底色》之后,于本年度推出长篇小说《牵风记》,描绘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期艳丽与瑰奇交织的战争风景线。此外还有冯骥才的《俗世奇人》、李陀的《无名指》等重耍作品。

被称为“50后”、“60后”的这一作家群,更是人人握灵山之珠,个个怀荆山之玉,每隔数年即有长篇新作问世,不仅是保持在一个持续稳定的水准线上,还时有内容和形式上的探索创新,让文坛拍案惊奇。单是2018年,就先后有贾平凹的《山本》、王安忆的《考工记》、刘醒龙的《黄冈秘卷》等相继问世并得到好评。

在中外文学史上具有一定规模的作家群落的出现,都有其文学的与社会的原因。那么,中国文坛产生“黄金一代”作家的机缘何在呢?

中国新文学百年,很少有大规模、成群落的作家,能够将他们的创作生命持续4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新文学伊始的“鲁郭茅巴老曹”,除鲁迅早逝,余者在

改革开放时代造成的剧烈的社会变迁,给作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作素材,也时时激发着作家的创作灵感和冲动。宏大叙事与个人情怀、史诗画卷与日常生活、大时代与小时代、主旋律与多样化,都得到了相当力度的刻画描摹。

进入新的时代语境之后,都有水土不服的症候,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鲜有新的力作问世,只有晚年写出《随想录》的巴金是个例外。左联文学时期柔石、殷夫、胡也频等的被难,在文学与革命的纠结上写下血腥一页;战争年代带给作家的苦难、流亡、迁徙、贫困,无处安放一张静心创作的书桌;此后不断发生的文艺批判乃至文化大革命,犁庭扫穴,摧折百花,都严重地伤害了文学的生产力。

与之相比,改革开放的40年,可以说给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指出,“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30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学指导方针确定了基调。

70年代末期以来,虽然说文坛上也曾经有大大小小的批评发生,但作家、读者都已经抛弃了简单粗暴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就事论事,就作品谈作品,没有简单独断的一棍子打死,不为一部作品就中止作家的艺术生命,作家并不会因此就失去创作的

权利,很快就能够调整创作心态,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以新的姿态重返文坛。

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时代造成的剧烈的社会变迁,从除旧布新拨乱反正到乡村中的土地承包,城市和工厂企业的体制变革,面向世界八面来风的激荡,再到市场经济和网络化时代的机遇与挑战,给作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作素材,也时时激发着作家的创作灵感和冲动。这40年可以说是充满艰辛也充满神奇的40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已经不足以形容其一二。立足于当下的现实而回望既往,对曾经被遮蔽的历史的重新发现,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双重思考,历史的视野因此进一步打开,产生相当一批长卷式的民族志和家族史写作。宏大叙事与个人情怀、史诗画卷与日常生活、大时代与小时代、主旋律与多样化,都得到了相当力度的刻画描摹。

时代的馈赠之外,还有作家们自身的勤奋和执著追求。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都是文学生长得天独厚的时期,社会情感积聚甚久亟待迸发,文学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市场化初起之际,也有为数不少的作家转身商海。在这样严酷的筛选下,能够坚持在文坛走过来的作家,一定是有大的定力、大的坚持,此其一;他们在40年或者更为长久的时段中,还要有强大的学习能力,有饕餮之胃,能够从中外文化和文学的海洋中广纳百川,厚积薄发,能够逐渐地攀上巨人的肩膀,使自己也变得高瞻远瞩,视通万里。

## ■纪念



□张玉太

朱子奇

秋风已凉,正是怀人的季节。我,以及我的许多文朋诗友,又怎能忘记,今年10月11日,恰是延安诗人朱子奇十周年忌日。

11日这一天,子奇的一些生前好友都络绎前来,缅怀他,悼念他。大家怀着同一心情齐聚一堂,纷纷叙说朱子奇的诗品和人品。深情的叙述中,无不认为子奇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自己的信仰,无不称赞子奇的社会担当与诗人情怀。还记得已故诗人臧克家曾十分称赞子奇的诗,认为他的诗作独树一帜,尤以政治抒情诗驰名于世。诗人贺敬之曾说,子奇是一位早于我的“老延安”,是一位永葆青春的革命诗人、人民的诗人。

曾经,我有幸作为《朱子奇诗创作评论选》的主编及《心灵的回声》《朱子奇诗选》的责编,有机会近距离地解读朱子奇和他的诗。在子奇10周年忌日这个特别的时刻,我心潮难平,有好多话要说。于是,我打开记忆的闸门,任时光缓缓倒流,再度回顾了我为子奇所作的一首诗——《献给诗人的花环》。这首诗是我的倾情之作,也是我众多诗歌作品中的得意之作。

我对子奇其人其诗是满怀着敬佩之情的。因而,我在创作《献给诗人的花环》过程中,怀着对这位诗人的敬意,也借用政治抒情诗的形式,撷取诗人革命及文学生涯的若干珍贵片段,予以铺陈、联想,意欲借此勾勒出诗人革命的一生,激情的一生,诗意的一生,闪光的一生。

在这首诗的第一节,我有意提取了两个典型性的形象,一个是烽火中的战士,一个是南泥湾的儿郎,这些形象对我来说很遥远,但对子奇来说,那仿佛就在身边,因为,他本人就是一名历经烽火硝烟的革命战士,一名从南泥湾走来的老兵。

“昨天和今天围坐一起 共诉衷肠/来的有烽火中的战士 延河边的儿郎/有蓝眼睛的国际友人/还有青松木棉 年轻的白杨”。

我想,子奇读到这一节诗,是会感到熟悉而亲切的。而这一节中提到的“蓝眼睛”的人,都实有其人,因为当时的延安,确曾汇聚了许多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外国友人。

叫我备感温馨的还有我在诗中写到的开放着白丁香和海棠花的小院,那是子奇与夫人陆璇在菊儿胡同的居所。子奇的夫人陆璇大姐是那么的可亲可敬,但又有谁知道,她曾是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的参与者与组织者,那个手执话筒向街头听众宣传我党抗日方针的女性,那个开国大典上与邓颖超大姐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千百万群众激情欢呼的女性。

“诗人呵 我真正认识您/是在蓄芳的菊儿胡同 小院向阳/在白丁香和海棠花的陪伴下/听‘心灵的回声’ 我心震荡/而这一切,一经化为诗句,便成为永恒的纪念!”

我因工作的关系,有幸造访那个小院,曾经的嘘寒问暖、谈笑风生,曾经的娓娓交谈,至今仍给我留下极其亲切、极其温暖、极其珍贵的回忆。

在我心目中,朱子奇还是一位出色的活动家。他曾多次肩负重托,足迹遍及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播撒和平的种子,传扬友谊的声音,讲述中国的故事,结识文学的朋友。他将这一切付诸文字留存于诗篇中,把革命工作予以诗意的升华。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曾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苏联,在那里,他给毛主席、任弼时留有一张珍贵的历史性合影。我在《献给诗人的花环》一诗里亦曾提及。

“在莫斯科郊外的早晨/您正为毛泽东 任弼时照像/看镜中影像 听咔嚓一响/就把一种高尚的信仰定格在心坎上”。

朱子奇在与蜚声国际画坛的大画家毕加索会面时,两人对和平的殷殷期许令人心动不已。

“在维也纳 您种植和平之树/您向大画家毕加索鼓掌/看他怎样把和平鸽放飞天上”。

朱子奇是革命诗人,也是爱好和平、传播和平的使者。他的视野里,有风云舒卷的变幻的现实,也有并未远逝的沉重的历史。

“在柏林 您和郭沫若/站在原国会大厦废墟之上/在希特勒自杀的地方留影/像是站在历史的肩头 风流倜傥”。

他花费大量心血精力为和平事业操劳奔忙,在莫斯科、维也纳、柏林,在伦敦的马克思墓、在法国的巴黎公社墙前,在布拉格、哈瓦那,每到一地,都印下子奇奔忙劳碌、稳健深沉的足印,都留有子奇才思横溢、热情激昂的诗篇,那些诗句如鲜花一般,盛放在和平的星球上。

成为一个诗人不难,而成为一个有信仰有情怀的诗人却不容易。子奇穷尽毕生精力,以一支笔,一颗心,去抒写革命,歌唱党,讴歌人民,传扬和平与友谊。他自己也曾如此坦承,并以此引为骄傲与自豪。

“从此,您坦然宣布/‘我首先是战士 是共产党员/然后才是一个写诗的人’”。

我们纪念朱子奇,不能回避的还有一个重要的话题,那就是:我们今天还要不要政治抒情诗?我的回答却是明确而肯定的:要!这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国家、党、人民,以及一切正义的事业,都需要大力赞颂与弘扬。

我创作《献给诗人的花环》一诗,也是在试图用我的文字去践行前辈革命诗人的诗歌理念。我坚持认为,诗歌创作要有境界,要有激情,更要博大的情怀,要“功夫在诗外”。我相信这并非我的一家之言,应是众多诗人的共识。我们应理直气壮地提倡质美兼美的政治抒情诗。此刻,我愿以这首《献给诗人的花环》,向朱子奇致以敬意,并借此机会表达我对政治抒情诗所秉持的坚定的自信。

写下此时的中国故事,让未来转身看时看得见历史风景。

陆梅谈到,在这个时代,无论新媒体、新科技怎么变,资讯信息如何爆炸性增长,一些基本的标准、一些坚持和守护,不太可能轻易改变。借用画家黄宾虹的一句话,就是“屡变者体貌,不变者精神”。这“精神”,也就是文学的常道。作家需要保持对经验世界的警觉,保持一种内在的创造性活力和积极主动的探索精神。作家要从大量的碎片化信息中走出来,走到信息和故事的背面,探寻现实的复杂性,并以丰富的想象力重新建构一个更有行动主体性的“内宇宙”。

张莉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是同生共长的关系。伴随着文学创作的繁荣,文学批评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但在当下,我们需要进一步重视文学批评的审美信任问题。现在作家的涉猎面非常宽广,相应地,对批评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批评家要有大量的阅读,有足够的宽阔的眼光,有雅正的美学趣味,也要有审慎的态度。他应该成为作家和文学的“同时代人”,要与自己的虚荣心做斗争,要有职业的良知,不能辜负了读者与作家的审美信任。

# 自由的呼吸吐纳

□彭 程

自由的关注、自由的思考、自由的表达,40时光的陶冶,才有了今天堪称蔚为大观的散文成就。而在今后的40年,乃至更长久时间内,关于散文的生长之道,也很难想象会有根本性的歧异。天地之间,旷野之中,手足舒展,目光递送,自由地呼吸吐纳,应该是散文写作者永远秉持的姿态。

意念。事实上,在这方面我们的确也看到了一种充分的表现。

在一些具体作品的背后,可以看到散文的观念也在不断地修订。内涵的变动势必导致外延的重构,散文的疆域也随着这种再认识而相应地扩展。譬如瞩目现实是对文学整体的基本要求,然而什么是现实?不必局限于具体的经验或客观的存在物,主观想象所营造出的虚幻天地,前世来生,仙界魔域,也未必没有真实性的折射,想来在今天这一点基本上已经成为共识。其实,“心外本无物”,“我思故我在”,唯心与唯物并非泾渭分明截然不同,有些时刻文学甚至仰仗于这种思维。暮年的杨绛把对已经逝去的丈夫和女儿的思念,化作一个断续跌宕、“长达万里的梦”,在梦境中的小船里、驿道上,与亲人相聚相失,牵挂且焦虑,谁能说这是荒诞不经?当越来越多的挑战甚至颠覆传统认知的作品出现,一些争议也便很自然地产生,如散文能否虚构,就长期成为一个焦点且迄今莫衷一是。

但如果守住了本质真实的底线,人们仍然愿意给予最大幅度的宽容。不知不觉中,散文的质的规定性在缓慢地嬗变,是写作和阅读的合谋,促成了这种调整。只有在40年的时间刻度下,才能够真切地意识到变化幅度之大。

总之,散文的路径四通八达,应许着无限的广阔和众多的可能。如果对其覆盖的深广程度打个比方,它仿佛是一阵大风,拂掠之处,大地上每一个角落、每一条缝隙,都被吹拂和灌注。就其文本的大众性而言,从没有一种其他的文学样式能够像它这样,达到对存在的如此密切而深入的贴近。笼罩在散文的广

阔田亩之上的,是世界和生活的巨大而完整的投影。

自由同样体现在对散文艺术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上,既包括继承,也包括创新。后一点尤为关键。“形式即内容”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种现实操作。当既有的形式和手段无法有效地表达出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时,创新就成为必须。而前述内容题材的开放一样,这个方面也不曾设置禁区,无需画地为牢。

几十年前,散文写作尚在传统的路径上循规矩步,但如今散文写作探索的幅度,已经从整体上跨越了那个阶段。从颇为陌生化的审美体验出发,一种截然有别的新形式,涉及到题旨、结构、节奏、语调等一系列的范畴,出现在蒋蓝、祝勇、宁肯、汗漫、黑陶、庞培、于坚、周晓枫、张锐锋等人的文本中,产生了相当的冲击力。语言的密集、修辞的夸饰、意象的繁复、思路的跳宕、文体的交替……经由时光的沉淀之后,相信有一些会很自然地产生,如散文能否虚构,就长期成为一个焦点且迄今莫衷一是。

这样,一个合格的散文写作者就不应该再轻率地抱怨。如果他写不出好作品,他首先应该检讨质疑的是他自己,他的素养和识见是否能够与时俱进、不断精进,以便适应这一文体在流变中涌现出的新功能属性,以及由此派生的一系列要求。

自由的关注、自由的思考、自由的表达,40时光的陶冶,才有了今天堪称蔚为大观的散文成就。而在今后的40年,乃至更长久时间内,关于散文的生长之道,也很难想象会有根本性的歧异。天地之间,旷野之中,手足舒展,目光递送,自由地呼吸吐纳,应该是散文写作者永远秉持的姿态。

写出对时代具有震撼和补救作用的作品,为新时代留下我们书写的“史记”。

## 更好地处理新时代的新经验

何向阳说,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前所未有,在人类发展史上也绝无仅有。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学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作家与评论家之间密切交流,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良性互动。作家与评论家在这40年里建立起来的团结和谐条件下的深层对话关系为新时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文学博鳌论坛的举办,也正致力于进一步巩固这种深层对话关系和良性文学生态。深层对话不是一团和气,而是说真话、讲道理,是评论家与作家真诚地做诤友,是针对文学创作中的问题敢于发声、悉心总结、深入研讨,褒优贬劣,激浊扬清,从而有效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积极推动文学创作由“高原”向“高峰”不断迈进。

孔见谈到,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经济

的建设,让物质资料尽可能的丰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精神的生活,追求优雅、高贵的灵魂,而文学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信会有更多作家关注时代和社会的新变,积极书写人民精神面貌的改变。

徐则臣说,改革开放40年文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站在这个历史节点,我们还应该思考当下文学所存在的不足,以便推动它更好地发展。作为一个编辑,在阅读稿件的过程中,常常感受到一种审美的疲劳,很多作品显得陈旧,与这个世界错位、脱节,无法让人产生共鸣。因此,在这个巨变的时代,作家需要敞开自己的所有感觉,寻找那些可能是“变”和“新”的蛛丝马迹,然后尽力地表达出来。新的时代和世界,必定有一个区别于过去的结构,作家需要不断寻找这个新的文学结构。

葛水平说,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40年的乡村发展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从乡村的人、事、物中,写作者可以纵观历史。面对日常化语境的今天,小说创作在经往山路崎岖的行程中正通往宽阔的道路,写作者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由延安诗人朱子奇  
兼谈政治抒情诗